

基于“轻介入”策略的老旧社区“代际健康育儿空间”设计与治理研究

张骐跃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 针对老旧社区体育空间更新中将“适老化”与“儿童友好”分离配置所引发的“合成谬误”，研究将“一老一小”界定为“代际育儿单元”，提出“代际健康育儿空间”这一分析与设计概念，并以社区体育空间这一日常身体活动最为集中的现实场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建筑民族志、考现学记录、建筑图绘与类型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京市鼓楼区13个老旧社区进行考察，共获得有效行为记录75个。研究提炼出陪伴性移动、边界性看护、观察性陪伴、互动性游戏、教育性互动和独立性活动6种典型行为模式。结果显示，当前社区中高频出现的主要是对“合成谬误”更为敏感的书护与基础陪伴模式，而能够实现双向健康增益的深度互动模式相对稀缺。由此表明，老旧社区体育空间的主要症结不在于设施数量不足，而在于将“代际育儿单元”拆解为分离对象所造成的关系失配、治理碎片化与空间设计失语。基于此，研究提出以关系重构为核心的“轻介入”更新策略，主张通过激活存量资源、优化支持性场景与促进多元协同，推动社区体育空间由分龄设施叠加转向支持代际健康互动的复合场域。

【关键词】 代际健康育儿空间；社区体育空间；合成谬误；全民健身；非正式体育行为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6)01-0039-14

DOI: 10.15877/j.cnki.nsic.20260417.002

近年来，城市更新已成为我国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回应民生需求的重要战略方向。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1]。《202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稳步实施城镇老旧小区、城中村等改造^[2]；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城市更新的专项规划与重点片区的更新策划正在快速推进，城市建设正在由单项设施的短板补充转向社区生活品质与空间支持效能的整体提升^[3]。在这一背景下，结合老旧社区改造，探讨社区体育空间如何更有效地支持“一老一小”日常活动、身体参与和健康互动，已成为兼具现实针对性与政策前沿性的重要议题。但在实践过程中，宏观政策目标很难直接转化为具体的空间标准，社区更新往往应采用清晰界定服务对象的方式推进^[4]。面对“一老一小”共同构成的日常生活场景，很容易把老年人^[5]与儿童^[6]视为两个彼此分离的对象，分别进

行配置和服务，进而形成空间更新中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分别看似合理的供给策略，在叠加后可能导致空间资源的错配、代际互动的缺失，甚至带来双向健康的损耗。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设施够不够，而是社区更新能否真正回应“一老一小”作为“代际育儿单元”的关系性需求。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体育设施本身及其管理问题，而对代际育儿过程中形成的关联性空间需求关注不足。所以，研究将“代际健康育儿空间”界定为一个分析与设计概念，用以指称在社区体育空间及相关边缘场所中，支持“代际育儿单元”共同完成看护、陪伴、游戏、教学与成长的关系性场景。研究的核心不再是如何分别提升老年人与儿童的设施供给，而是如何在社区体育空间这一具体场域中，探讨

收稿日期：2025-12-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TYC002)。

第一作者：张骐跃，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空间民族志，战术都市主义，路上观察学及其设计转化，建筑学学科发展史。

代际健康育儿空间的生成与建构。

1 研究设计

研究将“一老一小”视为一个“代际育儿单元”。首先借助考现学与建筑图绘^[7],对社区体育空间中的代际育儿活动进行观察与记录;再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8]表格,梳理人、设施、路径、规则等要素之间的关系;随后运用类型学方法,从田野调查中提炼出6种典型的代际育儿模式,并对其健康效能进行评估;最后将这些行为模式转译为空间模型。

在实践层面,通过“修补匠”思维^[9]组织场地中的既有资源,通过材料组合、循环利用与微更新的方式,对承载相关行为的社区空间进行“轻介入”改造。

1.1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首先,就社区体育治理的整体视角而言,我国社区体育空间面临系统性的供给与治理难题。相关设施存在“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10]“类型单一与低质化”^[11]以及“供需信息不对称”^[12]等突出矛盾,导致设施使用效率低下。其原因可归结为布局不合理、管理维护缺位、专业指导缺乏及活动组织不足等因素。为应对这些挑战,治理模式正经历从政府单一主导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转型^[13]。但在实践中,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能力与居民有效参与等方面仍面临显著挑战。这些研究表明,社区体育空间的效能提升,不仅关乎设施本身,更关乎深层次的治理结构与供需匹配机制^[14]。

其次,对于“一老一小”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大多呈现出显著的平行与割裂特征。一方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聚焦于“代际合作育儿”在中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普遍性及其重要的社会意义^[15],如提供情感支持、促进文化遗产与缓解家庭压力;另一方面,在空间规划与设计领域,“儿童友好”与“老年友好”作为两个独立议题,已分别发展出相对成熟但彼此孤立的设计原则与标准体系(如儿童设施的游戏性、安全性,老年人设施的无障碍、社交性)^[16]。这一现状导致在社区更新实践中往往采取简单的“分龄设施叠加”策略。

对于承载日常育儿活动的社区公共空间关注不足^[17],尤其是针对代际育儿的空间设计与改造,几

乎没有涉及。现有研究充分论证了“代际育儿”这一社会事实,却普遍忽视了其赖以发生的空间事实。公共空间支持的缺位,使得积极的代际互动意愿受挫于不友好的物理环境,育儿甚至有时会转化为身心负担。如何将代际育儿的社會需求转化为可持续的、融入日常的空间语言,成为连接社会政策与日常生活的核心问题。

因此,研究从关系性视角出发,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建筑民族志与类型学方法,讨论老旧社区中代际育儿行为的空間支持条件,并据此提出“轻介入”的更新路径。

1.2 概念说明

1.2.1 社区体育空间

研究中的“社区体育空间”特指老旧社区内承载居民身体活动、日常健身与非正式体育行为的公共场所及其设施。它并不局限于规划的正式健身场地,还包括步道、广场、宅前空地、廊下、绿地及社区边缘空间等一系列能够支持身体活动发生的场域。社区体育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层面的空间容器,而是“代际健康育儿空间”得以生成的现实核心载体。

1.2.2 代际育儿单元

“代际育儿单元”是研究的核心分析单位,它指在老旧社区中由祖辈与孙辈基于育儿责任与血缘情感纽带所构成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与需求共同体。该概念强调,在社区体育空间的使用中,老年人与儿童并非彼此孤立的服务对象,而是在日常育儿实践中紧密互动、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性社会单元。将两者视为一个单元,是破解“合成谬误”、理解其关联性健康需求的前提。

1.2.3 代际健康育儿空间

“代际健康育儿空间”是研究提出的核心分析与设计概念,指在社区体育空间及其相关边缘场所中,围绕“代际育儿单元”的共同活动而形成的支持性关系场景。它并不等同于一种独立的新空间类型,也不简单等同于“社区体育空间”,而是指后者在支持祖孙共同完成看护、陪伴、游戏、教学、休憩与成长等复合行动时所呈现出的关系性空间状态。其关键不在于分别增加“适老化”与“儿童友好”设施,而在于使相关行为能够在同一场景中顺畅地发生、切换与转化。在具体研究中,“社区体育空间”作

为老旧社区中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最集中、最可观察的现实载体,是研究的重点,并非“代际健康育儿空间”的缩减版。

1.2.4 代际育儿活动

研究将“代际育儿活动”界定为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由“代际育儿单元”共同参与的,以育儿照护为核心目的的,伴随或衍生出身体活动的行为集合。其核心特征在于“育儿”与“健身”的同步发生与相互嵌入。此类活动大多表现为非正式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如陪伴散步、看护游戏、共同运动等,是研究通过建筑民族志与建筑图绘方法捕捉的主要对象。

1.2.5 “轻介入”改造策略

“轻介入”研究所采用的空间更新策略,强调在尊重社区既有文脉、空间肌理与生活习惯的前提下,以小尺度、低成本、可渐进的方式激活存量空间^[18]。其核心有3点:一是少拆少建,通过微小的更新方法修补既有问题;二是尽量利用现有资源,降低改造成本;三是引入居民、社区与设计者进行协同参与,提高设计实施的可持续性。

“轻介入”在明确拒绝大拆大建^[19]的同时,通过精准干预,重组既有的空间关系,使场地更能支持代际互动,回应“合成谬误”带来的问题。

1.3 研究框架与分析逻辑

为破解社区体育空间中的合成谬误,研究建立了“观察—诊断—干预”的研究框架(图1),框架以关系性视角为基础,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工具,用来解释问题的生成,以及空间更新的介入。

1.3.1 理论框架:关系性视角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

研究将老年人与儿童理解为在日常育儿过程中共同活动、相互依存的“代际育儿单元”。在这一前提下,“代际健康育儿空间”不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独立空间类型,而是祖辈、孙辈、设施、路径、视线条件、规则观念等多种要素在具体情境中共同作用后所形成的关系性空间。

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每一次的代际育儿活动为一个临时产生的“社会—空间行动者网络”,所以在田野调查中,观察的不仅是祖辈与儿童之间的互动,还需要考察路径组织、设施布置、停留界面、边界条件、安全认知等因素,并剖析它们是如何参与行为生成的,即这些要素之间是否形成了支持祖孙共同活动的有效联结。所谓的“合成谬误”,正是在这一联结失效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研究中起到“关系识别”的功能——它从看似琐碎、零散的日常活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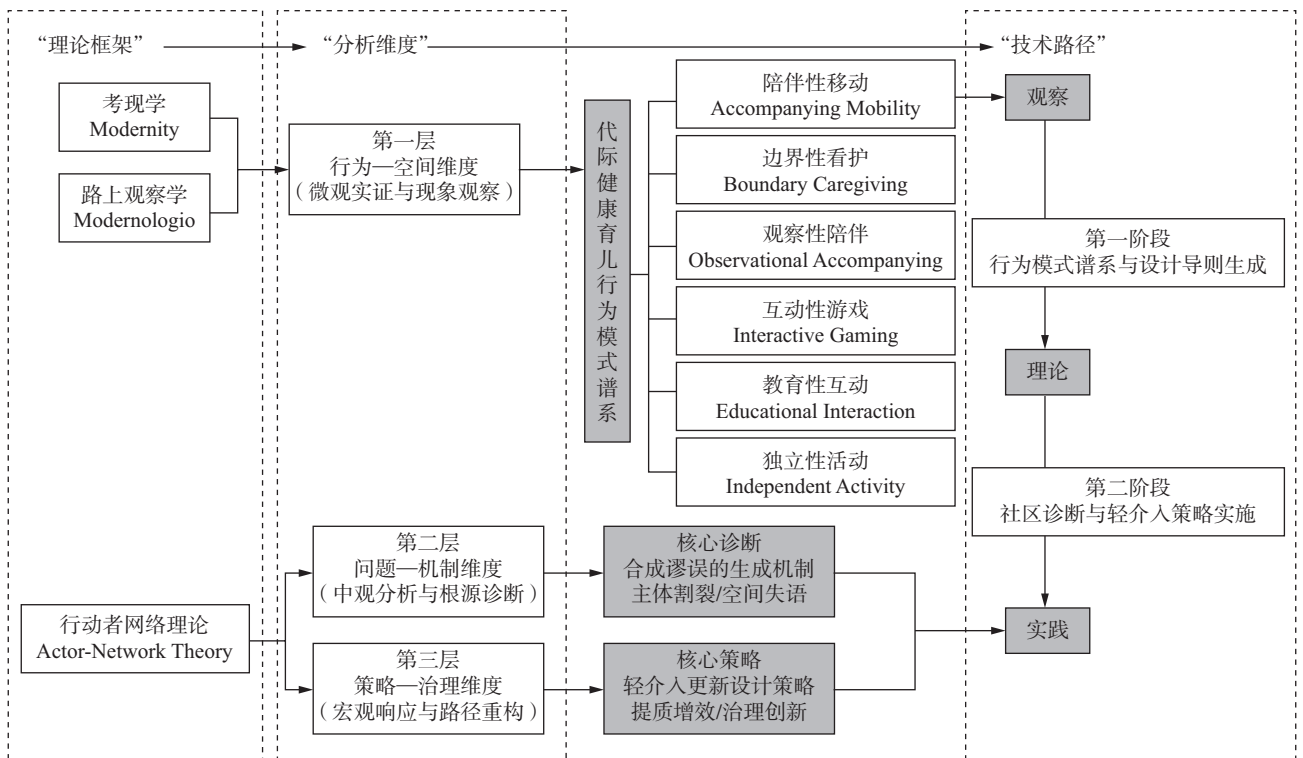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示意图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diagram

识别出哪些空间要素在支撑日常活动。以此为基础进行的行为模式的提炼是建立在这种关系识别基础上的结构性归纳,而进一步提出的“轻介入”设计策略,也不是针对单一问题的补丁式回应,而是对既有行动者网络的重新组织与定向修正。所以,关系性视角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是贯穿研究“观察—诊断—干预”全过程的分析支点。

1.3.2 分析维度:三层递进的逻辑结构

第一,“行为—空间”层面,关注祖孙在社区中的真实活动,并从田野记录中提炼行为模式;第二,“问题—机制”层面,讨论这些模式为何会形成,以及主体认知割裂和空间支持不足如何共同造成“合成谬误”;第三,“策略—治理”层面,基于前述诊断,提出“轻介入”更新路径,讨论如何通过小尺度改造与协同治理重组既有网络。

1.3.3 技术路径:两阶段实证研究与设计转化

第一阶段,行为识别与设计转译阶段,主要完成“行为—空间维度”和“问题—机制维度”的分析。研究首先通过建筑民族志、考现学和建筑图绘,观察老旧社区中的代际育儿活动;随后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表格,梳理行为与空间要素之间的关系;再运用类型学方法提炼稳定出现的行为模式^[20],并评估其健康效能;最终将这些行为模式转译为空间诉求,形成支持代际健康互动的设计导则。第二阶段,社区诊断与策略实施阶段,主要完成“策略—治理维度”的实践转化。研究以典型老旧社区为对象,运用前一阶段的分析对社区体育空间进行诊断,识别其中的问题类型与资源潜力;在此基础上,以“修补匠”思维和“轻介入”原则为指导,结合居民、管理者等多方参与,提出并实施定制化的空间更新方案,尝试将原有的问题空间转化为支持代际互动的场所。

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提供分析工具和设计依据,第二阶段的实践检验并修正第一阶段的判断,并以往复(Field Back)的形式,在实践后调整第一阶段的分析,形成设计思考的闭环,实现从行为观察、机制诊断到策略生成的研究路径。

1.4 基于考现学的代际育儿活动捕捉

研究采用考现学作为进入田野的重要方法。由于老旧社区中的代际育儿活动并不主要以标准化、制度化的体育项目出现,而更多地表现为夹杂在日常生活之中的非正式身体实践,如陪伴散步、边走边

看、临时停留、游戏看护、共同练习和交流教学等,这类行为往往持续时间短、转换频率高、活动边界模糊,既具有育儿照护属性,又伴随身体活动的发生,若仅以一般行为观察或设施使用统计来观察,容易忽视其真实性与复合性。考现学所强调的,正是对这类日常现象进行低干预、连续性和情境化的观察与记录,因此与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适配性。

在具体操作流程上,结合建筑图绘,形成了一套“行为记录—空间标注—关系整理”的工作流程。首先,通过记录表对代际育儿活动进行现场记录,重点记录行动者的构成、活动内容、停留方式、持续时间、互动频率及他们的行为转换情况,尽可能多地保留活动发生时的原始信息。其次,将观察所得同步转译到社区平面图或卫星航拍图上,标注活动点位、移动轨迹、停留节点、聚集区域及其与周边设施、界面的关系,将原本转瞬即逝的行为过程变成空间化的视觉呈现。在遵循隐私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以照片与录像作为补充材料,记录具体场景中的身体姿态、设施使用方式、视线关系和边界条件,作为后续分析的素材。最后,借助“ANT行动者关系记录表”,将活动拆解为由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关系单元,梳理其中哪些要素在促成互动,哪些要素在制造阻滞,哪些要素只是表面存在却未真正参与支持。因此,考现学与建筑图绘,不仅记录发生的事件(Events),更为后续的行为模式、分析生成机制、提出设计策略,提供微观经验基础。

1.5 基于类型学的体育行为谱系建构

在完成田野观察与关系记录后,研究引入类型学作为整理材料、提炼结构的分析工具。研究所述的类型学是一种从反复出现的现实结构中识别稳定关系的方法,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和关系分析基础上的结构提炼。它将前端的经验材料与后端的机制诊断、空间回应与“轻介入”策略连接起来,使研究能够从具体的场域观察推进到更具解释力与操作性的设计判断。类型学的对象也并非孤立的行为名称,而是行为、空间与支持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

首先,通过建筑民族志、考现学记录与建筑图绘积累了大量关于代际育儿活动的原始材料;其次,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将这些活动拆解为包含人、设施、路径、界面、停留点、视线条件与规则观念的关系结构;最后,对不同案例中的关系结构进行比较,识

别其中反复出现且具有相似行为结果的组合形式。在这一比较过程中,一些看似偶发的活动逐渐显示出稳定的结构特征,最终归纳出6种典型的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

2 社区体育空间中的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谱系与“合成谬误”的实践表征

研究于2025年9—11月,在南京市鼓楼区13个老旧社区展开。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聚焦于工作日傍晚和工作日晚餐后的代际育儿日常活动高频时段,在社区体育空间内进行系统观察。研究共获得有效行为记录75个,对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表格53份(行为相近的活动只填写一份表格),行为地图26幅,影像资料140余份。通过将这些分散的行动者网络记录进行并置比较,一些特定的行动者组合与互动关系会反复出现,并稳定地导向相似的健康行为与互动体验,最终根据这些反复出现的、稳定的网络结构与行为结果的对应关系,归纳提炼出6种典型的“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每一种模式对应着一类日常的且被反复验证的“社会—空间行动者网络模型”。

2.1 社区体育空间中的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谱系

6种典型的代际育儿行为模式,构成了一个描述代际育儿互动形态的谱系。一是互动强度,即祖辈与孙辈之间身体、认知与情感的参与和投入程度;二是监护参与度,即祖辈为确保儿童安全所投入的注意力与心理负荷水平。基于这两个维度,建立“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谱系图”(图2)。

2.1.1 陪伴性移动:以共同位移为核心的身体活动

陪伴性移动(Accompanying Mobility)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共同位移,即祖辈与孙辈以相伴而行的方式在空间内移动。这种模式的主体活动强度通常较低,主要以散步、慢走为主,其首要目的并非追求体育锻炼,而是在移动过程中实现情感交流、环境认知和适度的身体活动。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该模式的关键行动者除了祖辈与孙辈,还有连接各空间的步行路径、路径两侧的景观要素以及沿途的休憩设施,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场域,影响其移动路径、速度和持续时间。一个精心设计的充满趣味的景观节点和布有充足休憩设施的路径,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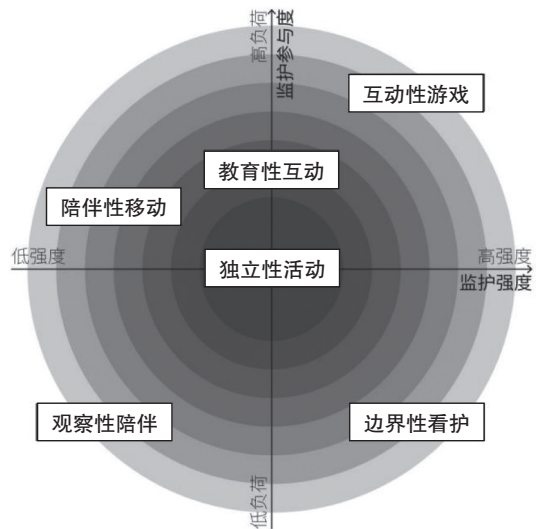


图2 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谱系图

Fig.2 A spectrum of behavioral patterns in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for health promotion

激发儿童的探索欲,延长祖孙共同漫步的时间,从而提升健康效益。

在田野调查中,就有类似的场景:在接孩子放学的过程中,孙辈将沿途的路牙、停车位上的金属杆等水平构件当作平衡木,在移动过程中寻求平衡挑战,祖辈在共同移动的同时提供搀扶与保护,形成了良好的交互。这种活动模式对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下肢力量的维持以及缓解孤独感具有显著益处,也有益于儿童的感官发展、空间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培养。

2.1.2 边界性看护:融合静态休憩与动态照护的活动模式

边界性看护(Boundary Caregiving)模式是一种以保障儿童安全为绝对核心的监护形式。其本质是祖辈在自身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对活动中的孙辈实施持续且高度警觉的安全监控。尽管祖辈身体处于休息的状态,但其精神始终处于待命状态,需要持续评估环境风险并随时准备干预,因此承受着较高的心理负荷。此模式首先需要消除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确保儿童的物理安全。其关键行动者除了进行探索活动的孙辈和处于警觉的祖辈外,还有潜在风险与吸引力并存的儿童活动吸引点以及作为监控观察点的支持性空间。

在田野调查中,该模式强烈依赖一个无视线遮挡且能让祖辈快速响应的视线通道——一个支持性的空间应确保祖辈的座位拥有对活动区一览无余的视野,并能便捷地抵达儿童身边。如祖辈坐在儿

童游乐设施旁的长椅上,身体面朝活动区,虽然可能不时与邻居进行简短的言语交流,但其注意力持续锁定在孙辈身上,身体姿态透露出随时起身的张力。这种模式为儿童提供了基础的安全保障,但对祖辈而言,其主要效益在于履行监护职责带来的心理层面的安心,而非身心层面的放松。

2.1.3 观察性陪伴:基于信任的松弛共存与情感支持

观察性陪伴(Observational Accompanying)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信任,它代表了代际互动育儿活动中一种更为松弛与健康的形态。相比于“边界性看护”,祖辈的角色从“安全监控者”转变为“情感支持者”,这一转变的前提是环境被感知为高度安全,使得祖辈无需进行持续的风险评估与精神戒备,从而能够真正沉浸于自己的休憩或社交活动中,仅以间歇性的、非警惕性的目光确认孙辈的状态。这种模式的内在动机是为孙辈的自主探索提供一个安全且充满信任的心理环境,并兼顾祖辈自身的休闲活动。其关键行动者有自主活动的孙辈和处于放松状态的祖辈,非人类行动者有被感知为安全的儿童活动场域以及提供舒适与归属感的视线通廊。因此,该模式下的理想空间不仅需要良好的视野,更需要环境本身具有舒适性与吸引力,能够支持祖辈进行阅读、深聊等相对专注的活动。

在观察样本中,祖辈坐在与活动区略有高差的空间下棋,仅当孙辈发出呼唤或长时间未出现在其视野中时才会自然地抬头关注。这种模式对祖辈而言,是一种低心理负荷的优质陪伴,能有效促进其社会交往与精神恢复;对儿童而言,在安全、独立的状态下进行活动与社交,有助于其身心的发展。

2.1.4 互动性游戏:祖孙共同参与、规则明确的游戏性活动

互动性游戏(Interactive Gaming)模式是代际健康育儿行为中互动强度最高、情感交流最深入的一种形式。其特征是祖孙双方共同参与一项具有相对明确的规则或目标的游戏性身体活动,如跳绳、骑车、下棋等体育运动,这种模式不仅包含了身体活动,更蕴含了规则学习、策略思考、技能传承和情感互动等多重维度。关键行动者包括参与游戏的祖辈与孙辈,以及游戏所需的器材、承载相应活动的空间界面等非人类行动者。互动性游戏通常发生在固定

的、有明确边界的场地内,其健康效益是双向且显著的:对于老年人,健身活动能有效锻炼平衡感、协调性和反应能力,预防认知衰退;对于儿童而言,游戏可以让其学习规则、发展运动技能,并从祖辈的指导和陪伴中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

这类活动样本在社区中并不鲜见:祖孙二人在楼前空地上练习跳绳,祖辈不时对儿童的动作进行指导;在社区健身角带有棋盘的桌子上用石头充当棋子,一起完成一场模拟的对弈等。这一模式对空间的可达性、设施的完善性以及环境的独立性都有较高的要求。

2.1.5 教育性互动:以文化传承为核心的代际知识传递

教育性互动(Educational Interaction)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文化传承”,即祖辈作为知识与经验的持有者,向孙辈传授知识、技能与社会规范。这种模式的主体活动强度通常较低,但其认知与情感的互动强度较高,主要形式包括讲解、示范、辅导与共同探索。其主要目的超越了单纯的身体锻炼或精神娱乐,具有文化性,旨在实现代际间的知识启发、文脉延续与价值认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该模式的关键行动者包括作为传授者的祖辈与作为学习者的孙辈,非人类行动者有承载知识的介质以及支持互动发生的教学空间等。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场域,影响着教学内容、互动方式与学习效果。

在调研中,有一处配备了科普标识牌的社区花园,列举了其中种植的各类植物。在实际使用中,祖辈的讲解意愿与孙辈的求知欲因此被激发,自然使散步路径转化为生动的课堂——祖辈在社区里向孙辈讲解小区内的各种植物,包括种植的树木、栽种的灌木,甚至是居民花盆中种植的蔬菜。此模式对老年人而言,是维持认知活跃、实现老有所为自我价值认同的途径;对儿童而言,则是构建知识体系、发展认知能力与建立文化认同的过程。

2.1.6 独立性活动:在安全距离内各自进行的并行活动

独立性活动(Independent Activity)模式描述了一种“亲密无间”的代际互动状态,在此模式下,祖辈与孙辈在同一空间内各自进行独立的身体活动。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共享空间与各自独立。这既满

足了老年人需要安静、低强度活动的需求,也支持了儿童活泼好动、探索世界的天性。关键行动者除了进行各自活动的祖辈与孙辈,还包括能够支持这两种截然不同活动需求的物理空间。

这种活动在调查中往往不以个体方式呈现,具有一定的组团特征。有数个社区都出现了祖辈聚集在社区广场的一侧进行低强度、高静谧性需求的交谈与晒太阳活动,而孙辈则在广场内追逐、玩耍,进行高强度、高互动性的游戏。此模式要求空间设计需要在一个相对紧凑的区域内通过空间手段来协调两种活动对环境的不同需求,以保证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老人与孩子互不干扰,但又能在视线范围内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2.2 行为模式的健康梯度及其对“合成谬误”的敏感性

研究提炼出的6种代际育儿行为模式是基于互

动强度与监护参与度的二元坐标系而建立的谱系,其目的在于揭示祖辈与孙辈间的关系性在社区体育空间中的多样存在。然而,这两个维度并不能直接用于判断代际育儿活动健康与否。若要进一步讨论行为层面的“合成谬误”,必须在分类的基础上引入进一步的界定。

健康的代际育儿行为并非单纯追求高互动或低负荷,而是要满足4项条件:一是祖辈与儿童均能从活动中获得身心收益,而非一方持续付出、另一方单向受益;二是监护负荷处于可持续、可松弛的范围,而非长期维持在高度警觉状态;三是活动能够支持儿童的探索、规则学习与社会发展,而非仅以风险规避为目标;四是空间能够支持祖孙作为“代际育儿单元”的复合行动,而非将其拆解为彼此分离的服务对象。由此,对上述模式的健康潜力及其对“合成谬误”的敏感性进行分析性评估(表1)。

表1 6种典型代际育儿行为在4项健康条件中的表现及其对“合成谬误”的敏感性判断

Tab.1 Performance of six typical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behaviors under four health criteria and their sensitivity to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行为模式	双向健康增益	监护负荷可持续性	儿童探索、规则学习与社会发展支持	对“代际育儿单元”复合行动的支持	对“合成谬误”的敏感性
陪伴性移动	较为符合	较为符合	部分符合	较为符合	中
边界性看护	部分符合	不符合	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高
观察性陪伴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中
互动性游戏	高度符合	较为符合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低
教育性互动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高度符合	低
独立性活动	较为符合	高度符合	较为符合	较为符合	中

6种行为模式并不存在简单的“健康/不健康”的二元区分,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合成谬误”的差异化敏感性。其中,边界性看护最易被主体认知割裂与空间设计失语固化;观察性陪伴、独立性活动与陪伴性移动则具有明显的条件依赖性;互动性游戏与教育性互动最能体现“代际育儿单元”的关系性,因而可以视为更能抵抗“合成谬误”的行为形态。

结合样本分布(表2,图3)可见,当前社区中占比最高的恰恰是对“合成谬误”最为敏感的看护与基础陪伴模式(陪伴性移动和边界性看护);而能够显著促进双向健康增益的深度互动模式(观察性陪伴和教育性互动)则相对稀缺。说明当下老旧社区中的代际育儿行为,并非单纯由家庭的日常习惯决

定,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既有空间与治理逻辑的塑造,即分布的失衡并不只是健康结果的差异,更是“合成谬误”在日常层面的结构表征。

表2 南京市鼓楼区代际育儿行为统计表

Tab.2 Statistics on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behaviors, Gulou district, Nanjing

代际健康育儿行为模式	样本数量	占比
陪伴性移动	24	32.4%
边界性看护	21	28.4%
互动性游戏	12	16.2%
独立性活动	12	16.2%
观察性陪伴	4	5.4%
教育性互动	2	2.7%
总计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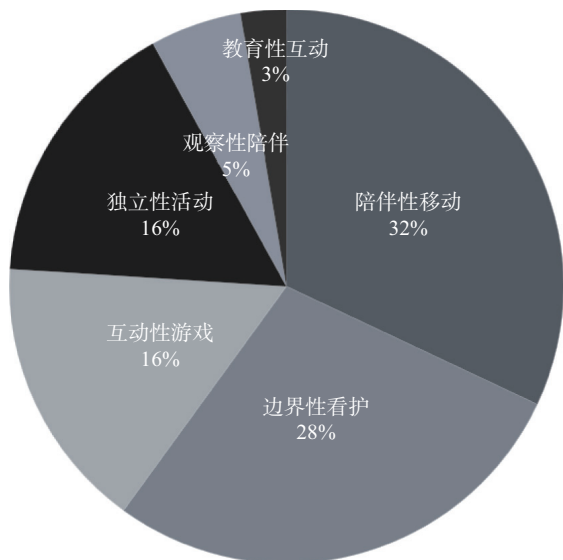


图3 南京市鼓楼区代际育儿行为统计图
Fig.3 Diagram of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behaviors, Gulou district, Nanjing

3 “合成谬误”的生成机制: 认知割裂与空间症结

3.1 主体层面的割裂: 从“代际育儿单元”到分离式服务对象

就行为分布可见, 老旧小区中大多数的代际育儿模式是陪伴性移动和边界性看护, 这两种行为恰好符合主流认知中对于老年人“带娃”的认知——由于儿童年龄小、需要照护, 所以祖辈自然以监护作为自己代际育儿活动的第一要务, 成为社区公共空间中的“照看者”。以监护为己任固然无误, 但过度聚焦于此就会带来主体层面的割裂, 即将祖辈与孙辈分离为两个独立的服务对象, 一个是需要休憩、健身和无障碍支持的“老年人”, 另一个是需要游乐、安全和活动场地的“儿童”, 而前者需要对后者进行监护成为两者间的唯一关系。这种对于两个主体间关系多样性的简化, 使得看护、陪伴、游戏、教学和休憩这些本应连续展开的复合行为, 被拆解为两个彼此分离的主体, 祖孙间作为“代际育儿单元”的共同体关系便难以进入设计与治理的视野。

这种认知上的拆分, 会逐渐转化为治理上的碎片化。不同部门的城市更新任务往往仅关注自身职责的范围——或关注适老设施, 或关注儿童活动, 或强调健身配建, 或强调养老托育等。这些目标看似都具有合理性, 但当它们缺少“代际健康育儿”这一具体的生活场景时, 空间的供给就会呈现出对象明确, 但关系缺失的状态。所以, 适老设施不能承载祖辈在看护儿童时的停留与参与, 儿童活动空间也

不曾考虑祖辈的观察、介入与共同使用的可能性。资源在物理层面或可能相邻, 但在设计逻辑上却彼此分离。

更重要的是, 这种分离式的理解并不只停留在制度与观念层面, 而会重新塑造日常行为本身——当祖辈被默认为监护责任的承担者, 当儿童被理解为被照护与被安排的对象, 那么边界性看护自然就成为最容易获得支持、最容易被接受的活动形式。相反, 那些要求祖孙共同参与、共同学习和共同组织情境的互动性游戏、教育性互动与高信任型观察性陪伴, 则因缺少相应的空间预设而难以发生。由此可见, “合成谬误”不是设施层面的偶然偏差, 而是服务对象被错误拆解之后, 在治理逻辑中被不断固化的结果。

3.2 空间层面的症结: 从“物理并存”到“关系失配”

若主体层面的割裂决定了认知基础, 那么空间层面的症结则决定了日常的使用。6种代际育儿行为模式表明, 不同类型的代际育儿活动对空间的需求有着明显差异。边界性看护高度依赖清晰的视线联系、便捷的介入路径与随时可达的停留位置; 观察性陪伴不仅要求环境基本安全, 还要求祖辈有能够真正停留、社交或休憩的舒适区域; 陪伴性移动与教育性互动则更依赖路径的连续性、界面的可读性以及可被共同解释和共同使用的场景支持; 互动性游戏还需要一定程度上可界定、可停留、可共享的活动场地。也就是说, 代际健康育儿行为对空间的组织方式、界面状态以及支持关系有着更为复杂、多元的要求。

但老旧小区更新中的常见做法仍然以分龄配置和功能补缺为主流——有空地便增设健身器材, 再找边角加装儿童装置, 或在有限场地中将不同设施并列摆放。这种“见缝插针”式的设计方法在形式上似乎同时兼顾了老人与儿童的需求, 实则仅为物理层面的并存, 并未触及祖孙共同活动所需要的关系支持。就边界性看护而言, 若活动区与祖辈停留点之间缺乏良好的视线和快速的响应条件, 祖辈的高警觉状态就难以缓解; 就观察性陪伴而言, 若空间只能保证视线的联通, 却无法做到对祖辈所需的日常行为的支持, 祖辈也难以从监护者转向低负荷的陪伴者; 就陪伴性移动、教育性互动和互动性游

戏而言,若路径、节点与界面无法支撑代际共同使用的的需求,那么空间就只能承载低强度的陪伴,难以进行有益的互动。

因此,空间层面的真正问题并不是设施数量的不足,而是既有规范与设计思路只服务于被分离的两个个体,没有触及“代际育儿单元”的关系性。使得更新后的社区能够配置对象,却不能组织互动;能够提供场地,却不能生成场景;能够满足各取所需,却难以支持交流互动。设计失语并非空间未经设计,而是空间设计没有把祖孙共同活动所需要的关系性转化为空间需求。

3.3 生成机制:认知、空间与行为分布的相互锁定

主体层面的认知割裂与空间层面的关系失配,并非彼此独立的两组问题,而是在日常使用中相互嵌合,逐渐形成了一种能够自我强化的生成机制。当祖孙被理解为两个分离对象时,治理与更新便倾向于按照分龄、分区、分功能的思路配置资源;而这种分离式供给进入社区空间之后,又会通过设施布置、界面组织、路径关系和停留条件,持续引导居民采取最容易发生、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行为模式。最终高频出现高敏感性的活动,而不是更依赖空间组织的互动模式。

长此以往,原有认知的被反复强化为刻板印象,使得管理者、设计者乃至居民自身,都把这些高频模式误读为真实的需求,进而认为祖孙共同活动本就只需要基础看护、基本陪伴和分龄设施,而无需为更高质量的互动投入额外设计与治理努力,一种由认知偏差出发、经由空间供给塑造、再由行为分布反哺认知偏差的闭环便形成了,而“合成谬误”正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不断出现与强化。因此,需要在认知上重建“代际育儿单元”的主导地位,在空间上发展能够支撑共同活动的组织方式,并在治理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协同路径。

4 “轻介入”策略:社区体育空间的提质增效与治理创新

4.1 “轻介入”作为破解“合成谬误”的综合治理处方

老旧社区中“合成谬误”的形成,并不是某一单项设施缺失所导致的局部问题,而是由主体认知割裂、空间支持失配以及两者在日常行为中相互强化

所构成的系统性结果。正因如此,“轻介入”设计的首要目标不是增补设施,而是重建空间对共同活动的支持能力,推动行为从高负荷看护转向更具双向健康增益的互动模式^[21]。是以较小尺度、较低扰动和更高场所敏感度的方式,重新组织既有资源,修复那些被切断、被弱化或被误读的互动条件,使社区体育空间中的代际育儿活动由主体割裂再次回到关系性的讨论之中。

“轻介入”之所以能够回应“合成谬误”,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强调从存量条件出发,不依赖整体的重构,重新识别老旧社区中已经存在却尚未被有效组织的空间潜力,包括边角空地、线性路径、遗存家具、停留界面及居民长期形成的使用经验;二是强调从行为模式出发直接进行情境化转译,不再追求老人与儿童分别的设施完善,而是围绕共同移动、边界性看护、观察性陪伴、互动性游戏、教育性互动等具体行为,对视线联系、可达路径、停留舒适度、互动媒介、活动界面等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三是强调通过居民、社区与基层治理者的协同参与,使更新过程本身成为重新建立关系认知与共享使用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次传统的施工过程。由此,“轻介入”真正对应的,不只是小规模改造的方法问题,而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适配度,对前文所揭示的生成机制进行定向的改善。

基于这一逻辑,研究视“轻介入”为一套与问题机制一一对应的综合治理处方。主体认知割裂与治理碎片化、空间规范脱节与设计失语、认知—空间—行为相互锁定的生成机制这三个关键问题,分别要求不同层次的回应,既需要通过关系再造与参与式设计来纠偏,又需要通过资源活化与场景设计来补充,还需要借助空间改造的介入来催化关系、重组网络(表3)。

4.2 “轻介入”的实践:针对三类“合成谬误”的机制回应

研究选取三个不同于传统更新方式的案例,针对三类不同的“合成谬误”进行设计回应。案例实践的价值不在于一次性解决老旧社区中所有代际健康育儿的问题,而在于揭示当意识到“一老一小”的需求不可被理解为简单的设施缺项时,轻量级、低扰动、关系导向的介入能够在不同层面上对既有的失衡进行快速的纠偏。

表3 “合成谬误”的问题—策略—案例对应关系表

Tab.3 Correspondence Table of Issues, Strategies, and Cases for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诊断的问题	“轻介入”策略的核心应对维度	对应案例
主体认知割裂与治理碎片化	关系再造与参与式赋能	宁海路A小区
空间规范脱节与设计失语	资源活化与情境化设计	虎踞关B小区
认知—空间—行为相互锁定的生成机制	微型空间介入催化关系网络重组	北京西路C小区

4.2.1 案例一：纠偏主体认知割裂——宁海路A小区的关系再造

宁海路A小区所暴露出的“合成谬误”并不表现为设施总量的不足，而表现为对服务对象理解方式的偏差。在社区原有的场地中，既有供老人停留的座椅茶几，也有供儿童活动的开放空间，看似已经回应了两类对象的基本需求，但这种“老人负责坐着看护，儿童负责在场地里活动”的简单预设忽略了代际育儿单元的关联性，所以结果自然是祖辈虽然在场，却主要以静态监护的高负荷方式存在，儿童虽然有活动空间，却处于被看管、被约束的状态中。空间所支持的是一种高心理负荷的“边界性看护”模式。可见当“祖孙”没有被作为一个“代际育儿单元”来进行设计时，场地即便实现了老年人与儿童的物理共存，也很难产生两者的健康互动。

针对这一问题，宁海路A小区聚焦于对既有要

素的重组之上。通过对场地内旧椅、长凳、茶几等家具进行普查、筛选和图示化整理，编制出一份面向居民的《育儿家具组合指南》(图4)，将原本仅被理解为“坐具”的对象重新转译为可供祖孙共同使用的游戏道具，如把椅子视作平衡木、把长凳与茶几组合为爬行隧道等。这样的介入并没有物质投入，却改变了居民对场所的理解方式——原来被默认用于“看孩子”的家具，开始被重新理解为“可以一起玩的媒介”；原来被默认承担监护责任的祖辈，开始成为活动的参与者、引导者与组织者。在这一案例中，设计的不是传统的物理空间，也不是家具的功能，而是场地中的主体关系(图5)。

就行为层面而言，该案例的关键意义在于它推动了主导行为模式的转化。原本出现的高负荷的“边界性看护”转向祖孙共同参与的“互动性游戏”(图6)，祖辈不再以单向监护为核心，而是在共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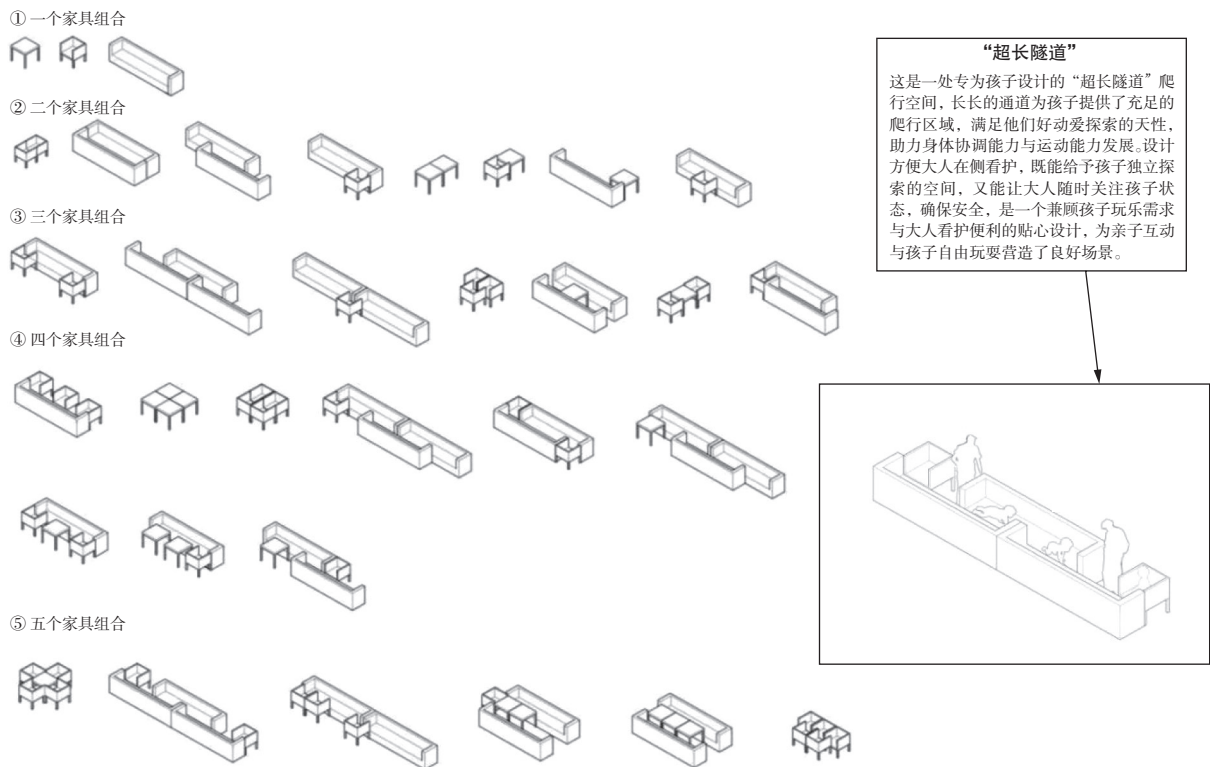


图4 育儿家具组合指南

Fig.4 Parenting furniture combination guide



图5 市民自发创造祖辈交流机会

Fig.5 Grassroots initiativ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图6 依照“指南”使用家具的市民

Fig.6 Citizens who use furniture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用家具、共同完成动作和协商规则的过程中,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儿童也从被照看对象转向互动主体。宁海路A小区的“轻介入”通过极低成本的关系再造,对主体认知割裂进行了局部纠偏。

4.2.2 案例二: 纠偏空间设计失语——虎踞关B小区的资源活化与情境化转译

虎踞关B小区的问题在于空间长期被预设为单一用途,从而丧失了回应复合代际行动的能力。小区内部有一条依山而建的线性路径,依照地势呈现出高低起伏的自然形态。这条道路在最初的设计中显然只是一条供居民通行的道路,然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当地部分居民早已自发将其转化为儿童学习自行车骑行的练习场,并且蕴含了交通规则学

习、安全提醒与骑行经验传递等更多样的互动可能。这一社区中的“合成谬误”是由空间功能理解过于单薄所造成的,单纯用于通行的社区内部道路没能回应祖孙共同活动的复合需求,未能回应居民日常对于道路的创造性使用。

因此,该社区的“轻介入”设计并未采取设置专用儿童车道、重新划定功能分区等高投入方案,而是沿着“信息赋能”的路径,对既有道路空间进行情境化的解构。设计利用路径两侧现有的墙体、电线杆等要素,置入一套模拟真实交通情境的标识系统,将原本单一的物理通道转化为可被阅读、可被学习、可被共同演练的“交通安全教学路径”。这一介入的关键在于回应了日常对于设计的需求——道路在日常使用中因其封闭性、起伏性与趣味性,自然成为祖孙共同练习、互相交流的复合型场景,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空间(图7)。

就行为转化而言,社区中的设计推动祖孙关系从“陪伴性移动”向带有学习性和规则意识的“教育性互动”延伸。祖辈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随行和保护,而开始承担解释者、提醒者和经验传递者的角色;儿童的活动也不再只是简单的位移,而转化为带有判断、模仿和认知建构的探索过程。由此可见,虎踞关B小区所验证的是许多老旧社区中看似普通与平庸的存量空间其实并不缺乏潜力,只是长期被单一功能的逻辑定式所局限,而日常的创造性使用又未能被感知和转化为空间语言,需要通过既有空间的重组与再定义进行激活。

4.2.3 案例三: 打破相互锁定的生成机制——北京西路C小区的关系网络重组

如果说前两个案例分别针对主体认知割裂和空间设计失语这两类问题,那么北京西路C小区所面对的则是两者在长期作用下相互强化后形成的锁定机制。由于小区缺乏适宜的公共空间,看护儿童的祖辈大多只能退守于单元门口或主路边缘,在狭窄、被动且缺乏支持的场所中进行高心理负荷的“边界性看护”。于是,认知偏差、空间失配与行为固化在同一场所中形成了闭环——越是缺少安全的场所,越容易出现高负荷看护,而越是出现高负荷看护,越容易让后续更新继续沿着提供高强度的看护空间的路径推进。

针对这一状况,设计并未依照田野调查中的居



图7 儿童自行车路线设计
Fig.7 Children's cycling route design

民诉求通过新建公共场地来改善现实中的“带娃难”问题,而是从社区内部搜寻被遗弃的家具、桌椅和花盆等存量资源,经过修复与组合后,在一个原本闲置的角落营造出一间“社区客厅”。这一介入虽然尺度不大,但改变了场地的社会组织方式——通过家具的围合、朝向与视线关系的调整,原本零散的、不可停留的社区边缘地带,被重新组织为既可以

照看儿童、又鼓励祖辈停留交谈的“社区客厅”(图8)。它所提供的是一个使看护由家庭内部私事转向邻里可见公事的场域。

就行为结果而言,北京西路C小区案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推动了主导行为模式的再组织。原本孤立、高压、以持续警觉为特征的“边界性看护”,开始在社区空间中转化为低负荷的“观察性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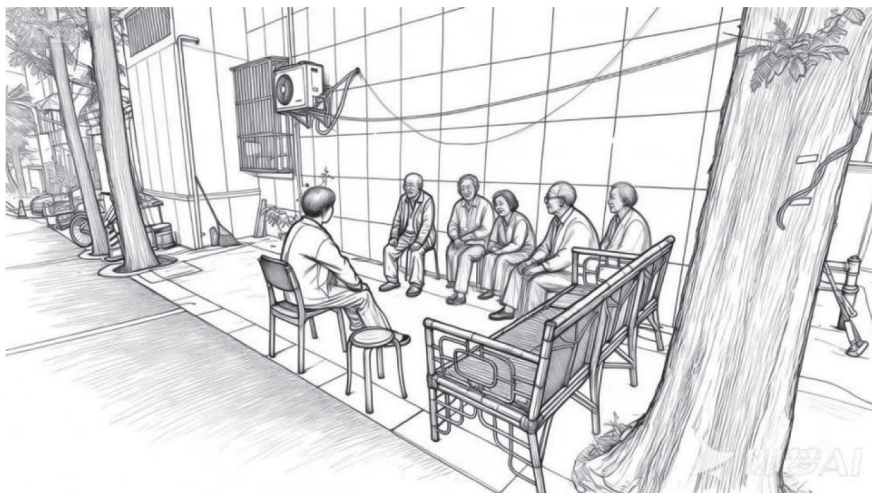


图8 在社区客厅停留的居民
Fig.8 Residents lingering in the community common room

当多位祖辈能够在“社区客厅”中停留、交流,并在视线范围内关注儿童的活动时,看护责任不再完全压在单一家庭成员身上,而开始获得邻里层面的分担与支持。与边界性看护相比,观察性陪伴所依赖的,不只是儿童活动区的安全性,更是祖辈自身能够真正放松、停留并保持社会连接的条件。实现的不仅是单纯的公共空间创造,而是对“认知割裂—空间失语—行为固化”生成链条的打断。

4.3 小结:从案例展示走向机制回应

“轻介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微更新,而是一种能够回应前文机制诊断的关系性设计。其中,宁海路A小区所验证的,是研究关于主体认知割裂的判断,表明当祖孙被重新理解为共同使用空间的“代际育儿单元”时,即便不增加设施,仅通过重组既有家具,也能够促使场地从高负荷的“边界性看护”转向支持祖孙共同参与的“互动性游戏”。虎踞关B小区所验证的,是研究关于空间设计失语的判断,表明老旧社区中看似普通的存量空间,并非无法服务于代际互动,而是长期被单一功能逻辑所掩盖,未能找到其中可能早已被转译为民间创造的关系性场景。通过对现有道路的信息赋能,原本主要承载“陪伴性移动”的通道,获得了向“教育性互动”延展的可能。北京西路C小区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关于认知—空间—行为相互锁定的判断,表明了当边缘性看护被恶性循环不断固化后,祖辈的监护责任被持续私人化,进而强化了对于高负荷的看护空间的更新预期。通过公共空间的介入,对存量资源进行重组之后,“边界性看护”转向“观察性陪伴”,看护事务由家庭内部转向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区支持。

以上案例验证了老旧社区代际健康育儿空间的失效并不是单一设施、单一场地或单一部门的问题,而是关系性需求未被识别、空间资源未被有效组织、行为又反过来强化既有认知偏差的综合结果。而“轻介入”设计的价值在于在存量条件下以较低成本对社区空间中的“合成谬误”进行定向修正,进而形成一套以行为转化为目标、以关系再造为核心、以协同治理为支撑的,在老旧社区中创造代际健康育儿空间的更新方法。

5 结语

针对老旧社区体育空间更新中普遍存在的群体

分置倾向,引入“合成谬误”这一批判视角,提出“代际育儿单元”与“代际健康育儿空间”两个核心概念。研究认为,当下社区体育空间的主要问题不是设施不足,而是既有的更新逻辑将祖辈与儿童拆解为两个独立的对象,忽视了两者的关系性,进而削弱了空间对代际共同活动的支持能力。

通过建筑民族志、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类型学分析,研究从老旧社区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6种典型的代际育儿行为模式,并发现现实中高频出现的往往是更容易导致高负荷看护和低效互动的代际育儿模式,而能够实现双向健康增益的深度互动模式相对稀缺。这表明代际育儿行为的现实分布并非只是家庭习惯或个体偏好的结果,而是受到主体认知、空间条件与治理逻辑共同塑造的,当下“合成谬误”生成的主要表现在于主体认知的割裂、空间设计的失语以及两者在行为层面的相互强化。

最终,研究提出“轻介入”作为回应这一问题的更新设计路径。强调从既有资源和日常真实情境出发,通过小尺度、低成本、可参与的方式重建代际互动所需的关系。研究一方面从关系性视角重新界定老旧社区体育空间更新的对象与目标,另一方面也为高密度、资源有限、治理复杂的老旧社区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更新思路。相较于分龄设施的简单叠加,这一路径更关注如何通过空间组织与治理协同,促成祖孙共同活动的生成,从而推动社区体育空间真正成为支持代际健康育儿的复合场域。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看城市发展新目标新路径[EB/OL]. (2025-07-17).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7/content_7032413.htm.
- [2] 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26-03-05).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25.htm.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会议在京召开[EB/OL]. (2025-12-24).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jsw/art/2025/art_8a5a8c4234dd4a7bb8c733ffcc84a880.html.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 450-2018)[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 [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 [7] 今和次郎. 考现学[M]. 东京: 乡土研究社, 1927.
- [8]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LÉVI-STRAUSS C. The Savag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 [10] 朱爱琴, 陈映. 社区体育设施供需矛盾与治理转型研究[J]. 体育科学, 2020, 40(9): 15-24.
- [11] 王竹, 赵兵. 微更新理念下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弹性设计策略[J]. 建筑学报, 2021(S2): 44-49.
- [12] 郑家颀, 韩宏宇. 城市社区体育治理共同体行动机制及实践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J]. 体育学研究, 2024, 38(6): 1-12.
- [13] 陈毅, 王占坤, 刘露, 等.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行模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5, 39(2): 87-98.
- [14] 马德浩. 建设社区体育治理共同体, 夯实群众体育治理根基[J]. 体育学研究, 2025, 39(1): 119.
- [15] 张晓婧, 戴映雯, 孙雯, 等.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社区“一老一小”代际融合设施建设研究[J]. 规划师, 2022, 38(8): 60-65.
- [16] 张晓婧, 戴雯, 等. 代际融合设施类型研究——基于美德日经验的比较[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6): 87-95.
- [17] 宋晟, 肖敏, 陆熹. 身体、行为、空间——重识公共空间中的“微观尺度”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4, 39(1): 60-66.
- [18]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沙坪坝区小微公共空间更新实践手册[R]. 2021.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Z]. 2021-08-30.
- [20] 贺唯嘉. 南京传统街区更新中的建筑类型学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0.
- [21]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行走上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总结报告[R]. 2020.

Design and Govern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Health-Promoting Childcare Spaces in Old Communities: A Light Intervention Approach

ZHANG Qiyue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Addressing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generated by the separate provision of age-friendly and child-friendly facilities in the renewal of sports spaces in old urban communities, the research defines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as an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unit and proposes the analytical and design concept of intergenerational health-promoting childcare space. Taking community sports spaces—the primary everyday settings for physical activity—as its main research field, the study investigates 13 old communities in Gulou District, Nanjing, through a combined methodology of architectural ethnography, modernology-based observation, architectural mapping,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yielding 75 valid behavioral records. Six typical behavioral patterns are identified: accompanying mobility, boundary caregiving, observational accompaniment, interactive gaming,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and independent activ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patterns in current communities are caregiving and basic accompanying behaviors that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whereas deeper interactive patterns capable of generating mutual health benefits remain relatively scarc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incipal problem of sports spaces in old communities lies not in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facilities, but in relational mismatch, fragmented governance, and spatial design absence caused by trea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unit as two separate target groups. In response, the paper proposes a light intervention renewal strategy centered on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advocating the activation of existing resources, the optimization of supportive settings and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so as to transform community sports spaces from the additive provision of age-segregated facilities into a composite field that supports intergenerational health interactio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space for health promotion; community sports spac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national fitness; informal sports activities